

宋代帝王宗教思想选择的原因

徐星华

(通化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吉林 通化 134002)

摘要:宋代虽是偏安王朝,先后与辽、西夏、金、大理、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相峙而立,但物质文明的繁荣与精神文明的昌硕仍是相映成辉。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这些活跃在帝王身边的后宫女眷、官僚士大夫们,他们的影响和帝王自身宗教信仰的取舍共同促成了帝王宗教思想的选择。

关键词:宋代帝王;宗教思想;选择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74(2012)03—0038—03

收稿日期:2011—11—16

作者简介:徐星华(1981—),女,吉林德惠人,现为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硕士。

宋代由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两个历史阶段构成。宋代对内中央集权日益加强,对外民族战争频繁、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中华广袤的大地上先后涌现了契丹政权辽(916~1125)、党项政权西夏(1038~1227)、女真政权金(1115~1234)与宋王朝相峙而立,同时在边疆地区还出现了大理、吐蕃、西辽、高丽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因此,两宋始终无法再现汉唐时期“威加海内、名震寰宇”的雄风。尽管如此,风物昌熙的物质文明与人文毓秀的精神文明仍是相映生辉,共同构成了两宋文明的完美乐章。

三教合流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结构的反映,提倡一种“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精神。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帝王自身信仰的取舍、活跃在帝王身边的后宫及官僚士大夫群体的作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宋代帝王顺应了三教合流思想,采取了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宗教思想为辅助手段的方针,允许佛道二教的均衡、适度发展。使得宋代帝王的宗教思想呈现出功利性、多重性、历史继承性的特点。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指出“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整个时代的氛围中透露出一种压抑和忧郁,对外的割地赔款弄得国家囊空如洗,对内的封官抚慰把人的意气消磨殆尽。尽管弱枝强干的政策使宋代的中央集权高度加强,但积贫积弱的现象也与宋史相伴始终。在这种时代氛围里,宗教又一次获得了滋生的土壤。

佛道二教入宋以后继续发展,宋禅一枝独秀,高僧大德辈出,“五家七宗”发展完备,临济一系最为发达。由过去的立文字变为编撰灯录、语录,大立文

字,谈禅与经教并行互补,虽在义理上缺乏新意,但方法上却屡有创新。三教合一、禅净合一的思想成为主流,奠定了宋以后中国佛教的主要走向。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道教地位也日益提高,不仅教派分化繁衍,新教派林立,而且内丹炼养体系发展成熟,道教哲学更加深化和系统。两宋曾六次编修《道藏》,道书编撰蔚然成风。佛道二教和域外传来的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祆教、基督教等共同构成了宋代宗教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宗教的内涵较为复杂,使得社会各阶层在接受心理上存在着差异。其中知识分子阶层注重从宗教文化中吸取哲理成分,既满足了玄奥的哲学思辨的要求,又陶冶心性,使抑郁的精神得到慰藉和解脱。社会地位与知识程度均处于低下水平的普通民众,则从急功好利的实用立场来看待宗教,哲学性浓厚的宗教对他们来说太深奥,而烧香、念经、布施、举办法会等宗教仪式虽粗鄙却简单易行,深入人心。宗教可以给任何人以心理慰藉,对在位的帝王将相,它承诺延祚增寿,赐福加禄;对失意的文人墨客,它提供精神的避风港;对有意为善者,它许诺来世的福报;对作奸犯科者,它提供善恶有报的因果轮回之说。总之,它满足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需要,使人们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可以说,宗教制造出了一个超越现实世俗生活的美好的彼岸世界,在这种理想化了的宗教境界中异己的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具有了超自然、超人间的神圣性。它以天国的幻想给处在苦难中的人们以安慰和麻醉,用美好的假象掩饰着统治者的锁链,将封建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变成神学

教条来束缚和麻醉忍苦受难的中国民众,使宗教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强有力的工具。

二、帝王自身的信仰

对人类自身精神家园的探求,是自有人类以来与物质世界的探索并行不悖的。而且,人们在物质世界中所遇到的难题、所不解的困惑,又回过头来到精神的领地中去寻找。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对彼岸幻影的信仰还很强烈很狂热,人就只能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取得一些内容。”^{[1]647}

帝王是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统一,虽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却也是世间的肉眼凡胎,面对世事的沧桑变化,心灵深处也充满着无尽的困扰。为了寻找精神寄托,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宗教领域,希望通过宗教使人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而进入自由的境界,在虚幻的满足中得到生存的力量。

太祖曾在人生一筹莫展之际遇一善术数的襄阳老僧,他不仅指引太祖北上从军而且倾囊相助,在投军路上太祖又于高辛庙掷得一天子卦,这些冥冥之中的神意成为太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待他登基后出于种种考虑便对佛教进行支持和保护。太宗“崇尚释教”,他死后,翰林学士承旨宋白在谥议时指出:他对“释老之教,崇奉为先,名山大川,灵踪胜景,仁祠仙宇,经之营之,致恭之诚广也”。^{[2]483}

两宋很多帝王由于痛苦失意而对道教深信不疑。真宗晚年,对外战争的连年失利使得他意气消沉,咸平之治时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只能屡靠“天书下降”、制造祥瑞来麻痹自己。自患病后日益迷信,他先时还说:“古人多言祷神可以延福,恐未必如此。”这时却不断幸遇宫观,拜神求佛,乞求神祇保佑。自天禧二年(1019)起他对军国大政也敷衍了事,平日里避居深宫,沉溺丹鼎。直至病情加重,他还命人在京师景灵宫中建万寿殿,让道尼、僧徒日夜为自己祈祷。仁宗晚年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日益迷恋于服食丹药。神宗在王安石变法最紧要时却向天下颁布了《道场斋醮式》二十八卷。

^{[3]2297} 哲宗二十三岁的生命丧于 20 粒“七返金液丹”之下。^{[3]4855} 当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徽宗犹自相信道教法术能抵御“金贼”,挽救“王师溃败”。派遣使者押解道士刘知常所炼“神霄宝轮”去各地宫观,宣称可以镇四方兵灾。“教主道君皇帝”徽宗即便作了囚徒,犹且身穿紫道袍,头戴逍遥巾,作道流打扮,真可谓至死不悟。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中称孝宗“尤精内景”,通道教练养术。孝宗曾亲撰《原道论》,倡“以道教养生”、“三教合一”。正是这些君主的宗教信仰促成他们宗教思想的选择。

三、后宫的作用

后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由太后、皇后以及众多妃嫔构成,她们是帝王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是最寂寞的人,长日漫漫,很多人只能靠诵经念佛、修道参禅来打发时间。她们的崇佛信道相应地也对帝王产生了一定影响。

太祖、太宗的母亲杜太后虔诚信佛,其娘家在安喜一带以好佛向善而闻名。陈桥兵变之前,赵匡胤为防意外特意把杜氏与夫人王氏等家眷老小全都秘密安置在僧寺定力院内,杜氏在定力院焚香拜佛,祈祷儿子成功。太祖皇后王氏端庄贤淑,出身名门,受婆婆的影响,她每天晨起,先要焚香诵佛经,然后到杜太后宫中间安侍候,因而深得婆婆的欢心。真宗的皇后刘氏曾拿出自己宫中全部的妆奁费用,派遣的使者遍及天下的佛寺、道观、名山胜境为赵恒祈福消灾。真宗的杨妃晚年专心于修身养性,布施钱物修建了几处道观禅院。仁宗美人周氏自仁宗驾崩后,单独搬到异室居住,把室内布置成经堂模样,从此与世隔绝,每日蔬食,诵颂佛书,困了累了便在床上躺一阵,醒了以后又复颂佛书。如此昼夜循环,专心致志,竟夜不脱衣达四十年之久,可谓虔诚之极也。

高宗时隆祐太后孟氏供奉“摩利支天母”,认为大宋能够安居杭州,实出于天母的冥护。高宗生母韦氏平生专心专意念佛奉道,靖康之变中她亦被虏,历经数载始得回国,途中她施舍黄金给佛寺以祈求神佛保佑平安归国,归国后每年都从得到的贡奉财帛中拿出一部分来供佛奉道。

四、官僚士大夫的影响

宋朝“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民智的开发。自由讲学之风盛行,促进了不同流派的传承与发展,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给学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同学派间的论辩研讨,推动了思想理论的创新,涌现出了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学者,他们各立门派、各阐其义、各臻其妙,在相互交锋、相互汲取的过程中兼容并蓄,发展了自唐以来的“援释入儒”、“援道入儒”的学术倾向,形成了内涵丰富、时代感鲜明的理学体系。

可以说,理学家们用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和佛教的思辨哲学体系,弥补了传统儒家形而上学部分的不足,“窃其精髓以自壮”,陈抟的《无极图》被周敦颐改造成了《太极图》,成为理学家公认的宇宙生成模式;华严宗“理事无碍”、“一多相摄”的思想方法,成为程朱构造理气关系的理论模本;玄觉禅师的“水月之喻”,翻演成朱熹的“理一分殊”……正如学者邓广铭所指,宋代学术文化长足进展的主要原因便是宋儒的觉醒,为达到重振儒家门楣,使之凌驾于佛、道之上这一目的,“首先就需要把儒家(下转第 44 页)

[14] 龚隼峰. 大战的序幕——试析英日同盟与日俄战争的影响[J]. 安徽文学, 2008(2):193.

[15]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M]. 上册.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责任编辑: 徐星华)

On Strategic Advantages of Japan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XU Fang, YANG Kai-qiao

(Teachers College of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Xinjiang 832003, China)

Abstract: The Russo-Japanese War was a decisive battle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for contesting the Northeast China. In view of its inferior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Japan made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military forces and was fully prepared for the war by relying on its solid economic strength. Meanwhile, Japan created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starting war. With these strategic advantages, Japan finally achieved victory in the war.

Key words: the Russo-Japanese War; Japan; strategic advantage

(上接第 39 页)的学说加以丰富、充实,于是而有人援释老以入儒,有人则援名法以及诸子百家以入儒,遂使宋代的儒家学说真正蕴有了内圣外王的内涵,到达了充实而有光辉的境界。”^[43]

而士大夫们在出入佛老,又归本儒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因为“宗教的职责,是说明幽冥的道理和造化的奥妙,而解答人们的疑惑的。所以具有生命的人类,谁能不倾心呢?”^{[5]124}

太宗朝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即领衔撰修五代史者就信奉道教,服丹砂求长生,后中毒而卒,太宗曾亲临其丧。文学家苏轼小时曾拜道士张易简为师。^[6]
⁴⁷ 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与道士许昌龄交往甚密,临终还赠诗给他说:“云深路绝无人到,鸾鹤今应待我来”。^{[7]580}

宋代是禅宗盛世,士大夫靡然向风,《宋稗类钞》卷七记载:“庆历中,士大夫多修佛学,往往作偈颂以发明禅理。”仁宗时,负责考核童行经业的宋绶和夏竦,各用十天和七天的时间背诵《法华经》,“不遗一字”。^{[8]462} 佛果克勤与张商英探讨《华严经》,张深为

信服,称其为“僧中管仲”。宝峰克文与苏辙、王安石等人交谊甚厚,博得苏王二公美誉。1077 年王安石甚至奏施金陵旧宅为寺,请真净克文禅师住持,赐额“保宁”。

两宋净土结社很盛行,苏轼曾与禅僧东林常总在庐山集道俗千余人建禅社,晚年致力于净土回归实践,“绘水陆法像,作赞十六篇”,建“眉山山水陆会”。其妻亡故后特设水陆道场供养。释省常在西湖刺血书写《华严经·净行品》,结净行社,王旦为首,参政苏易简等士大夫 132 人,皆称净行社弟子,比丘预者千众。文彦博兼译经润文使,在京与净严禅师结僧俗十万人念佛,为往生净土之愿。

当时很多学子喜欢借寓寺院读书,如吕蒙正读书于洛阳龙门利涉院,韩亿、李若谷读书于嵩山法王寺,范仲淹在长白山醴泉寺读书达三年之久,文同《丹渊集》录《重过旧学山寺诗》中亦有“当年读书处,古寺拥群峰”之语,因此许多名山大刹都可见学子在暮鼓晨钟相伴下苦读的身影。宗教潜移默化的作用必会对他们未来的从政生涯有所影响。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恩全集[M]. 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2] 钱若水. 太宗皇帝实录[M]. 上海:上海书店,1985.
- [3] 李 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4] 邓广铭. 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5] 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
- [6] 苏 轼. 东坡志林[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7]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8] 志 磐. 佛祖统纪[M]. 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清刻本影印,1992.

(责任编辑:李文)